

徽州文书与徽学

周绍泉

提 要: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0 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关键词: 徽州 徽州文书 徽学

一 绪 言

徽学(又称徽州学)是 80 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出现之后, 已有文章论述它和历史上作为新安理学简称的“徽学”的联系和区别, 也有文章指出它和历史上作为徽州府学简称的“徽学”的不同, 这大约是已没有争论的问题了。至于把这个新学科称为“徽学”好, 还是称作“徽州学”好, 曾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经过讨论, 这个争论似亦结束了, 但对徽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段等, 至今分歧很大。有人认为, 徽学研究的是徽州历史, “徽州学就是一门专以徽州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①。有人认为徽学研究的是徽州历史文化, “徽州学是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②, 是“一门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地方史学”^③。有人认为徽学研究的是一定时限范围内的徽州“大文化”, “徽州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在徽州出现的具有异常显著特点的徽州文化产生、繁荣、衰落的发展过程。徽州学就是研究这个特殊矛盾产生、运动和消亡的学问”^④。有人则明确反对这种“时限”说, 认为“将宋之前及鸦片战争以后的徽州文化断然地割除在徽学研

① 《徽州学丛刊·发刊词》,《徽州学丛刊》创刊号, 1994 年 10 月。

② 郑家琪:《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学会的工作任务》,《徽州学丛刊》创刊号。

③ 《歙县县委常委王德琪同志的讲话》,《徽州学丛刊》创刊号。

④ 赵华富:《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黄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编《徽学研究论文集》(一)。

究之外”，“仅就其忘记了徽州文化当有其来源即产生的历史条件基础及以后的演变来说，就应是不够完整的”，“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化应是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或重点内容而不应是唯一内容”^①。对于徽学研究的范围，有的强调限于徽州“一府六县”范围。有人则认为：“关于徽学的内容，看来‘历史的徽州’、‘徽州的历史’这两句话可以概括。而徽州的地域空间多次变化，淳安、婺源、绩溪都曾是徽州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则广阔得多，杭州、景德镇、南京、上海、扬州等等都是。”并指出：“新安江可说是徽州文化的摇篮。”^②即徽学研究不能仅限于徽州6县。有的人没有指出具体空间，但也认为不能限于徽州，“徽州文化不能仅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还包括由徽州而发生，由本籍包括寄籍、侨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创造从而辐射于外、影响于外的文化，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对徽州的强烈认同”^③。

关于徽学，我们也曾提出过一种看法，即：“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徽学’（又称‘徽州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并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④强调了徽州文书和徽学的关系。

本文试图从徽州文书的发现和徽学出现的关系中，探讨徽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 徽学何以会成为一门新学科

（一）新资料的大量发现促进新学科的产生

从1898年下半年发现有字甲骨至今，已经百余年。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即1899年以后，近代出土的汉晋木简，相继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居延面世^⑤。而敦煌石窟的宝藏——敦煌文书则在1900年重见天日。由于清末上述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大发现，出现了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三个新学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上述新学科有的已成为世界性显学。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发展表明，新资料的大量发现，促进新学科的产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⑥

同样，正是因为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徽州文书的发现，才出现了徽学这一新学科。据说，在好多年以前，安徽省博物馆的刘和惠先生就提出过这种看法，曾遭到激烈的反对，说徽学不是徽州文书学。这种意见也不无道理。确实，徽学不是徽州文书学。但如果没有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会有徽学吗？有人认为，是因为徽州文化内容异常丰富，成就异常辉煌，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关注，以徽州做研究课题的作者如林，才有徽学。试将徽州和苏州、杭州做个比较，苏杭的历史文化内容不也异常丰富，成就异常辉煌吗？特别是明清的苏州，是国内经济最先进的地区，物产丰富，商业繁荣，人文荟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徽州；国内外以苏州为研究课题的作者及其著述，亦不在徽州之下，可至今为什么没有被称作“苏学”或“苏州学”的学科呢？

①③ 刘伯山：《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价值》，杭州徽州学研究会编《杭州徽州学研究会十周年纪念文集》，1997年8月。

② 《会长吴存心在年会上的讲话》，《徽学通讯》总15、16期。

④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前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

⑤ 参见李学勤《古文字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22页。

⑥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再举敦煌为例，可能更说明问题。敦煌石窟造像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在敦煌文书发现以前，这里却人迹罕至，更没有以敦煌为研究课题的学科，正是由于敦煌文书的发现并用于研究，敦煌学才逐渐形成、发展起来。以往人迹罕至的敦煌石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旅游者，这除了因敦煌有我国人民创造的人类瑰宝——石窟造像之外，也和敦煌学为人所知不无关系。

所以，我们以为，徽学所以会成为一门新学科，其根本原因还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但这绝不是说，徽学只是研究徽州文书。不仅不是，而且必须在研究徽州文书的同时，研究内容异常丰富、成果异常辉煌的徽州历史文化。不然就不能看懂徽州文书，更遑论研究了。更何况，徽州文书本身就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极为珍贵的资料，对徽州文书的深入研究正是丰富和加深徽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途径。所以，把徽州文书和徽州历史文化隔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观点，既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不利于徽学研究的发展。

（二）徽州文书的特点

1957年，中国历史文化的又一大新发现见诸报章，这就是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以其数量大、种类多、涉及面广、跨越历史时代长、学术研究价值高而倍受人们关注。

现存徽州文书究竟有多少，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通常的说法是10余万件。这种说法是我于十几年前即1988年4月在安徽大学召开的“徽州文书整理经验交流会”上所做的《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整理与研究》报告中提出来的。其根据是1987年我在绩溪县采访中得到的。那是11月28日下午，我就徽州文书是怎么流传出来的，采访当时在绩溪县文管会工作的余庭光先生。他自1952年在屯溪新华书店工作，1956年9月屯溪新华书店下设一个古籍书店，他被任命为古籍书店的负责人。徽州文书主要是由屯溪的古籍书店收购，直接或经北京中国书店、上海古籍书店卖到全国各地去的。在谈到徽州契约收购时，余庭光先生说：“契约主要是从祁门收购的。祁门有个废品仓库，用麻袋装契约，有的竟用竹篓子装。1957年我去祁门收购了好几万份，装了许多麻袋运回来。我们收购的契约总数有10多万件。”于是，我在报告中说：“据屯溪古籍书店负责人余庭光估计，他们收购的契纸约10多万件。若再加上通过其他途径流传出去的，当比这个估计数还多。不过，由于这个估计数非常笼统，而经其他途径流传出去的数量与之相比又很有限，可忽略不计。以此估计数即约10多万件，大体上还是妥当的。”^①现在看来，这个数字就不妥当了。究其原因，一是那时许多收藏单位尚未对所藏徽州文书进行整理，估计数字偏低。如徽州地区博物馆（今黄山市博物馆）那时估计只藏近万件，现已查明有3万余件。二是那时有些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还不为人所知。如收藏徽州文书较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天津图书馆，便都没在我们那时所列收藏单位中。去年初我去山东省图书馆查资料，发现那里藏有从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徽州契约31张。以前谁也没有想到山东省图书馆还藏有徽州文书。最近听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900余件有关徽州资料，其中有七八百封与明末岩寺方用彬有关的信札。三是有些单位的收藏，这十几年间有明显增加。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收藏，那时估计约近万余件，现在经过整理，实际收藏14000余件，增加近四五千件。四是这些年徽州文书还不断地由徽州各县流传出来。如华南研

^① 周绍泉：《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整理》，〔日本〕《明代史研究》20号特集号。

究资料中心（广州）于1996年在黄山市购得一批徽州民间文书^①。在历史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日本学者也在黄山购得一批徽州文书^②。五是徽州各县民间仍藏有许多文书，数量难以估计。1997年我去黄山考察徽州古戏台的路上，就见到近百件从清中叶到民国年间的文书，被祁门县文管所购得。走在屯溪街上，在卖古书的地摊上就会发现徽州文书摆在那里出卖。有人说，徽州文书在原徽州属县范围内还有可能成批发现^③。也有人说：“目前还散落在民间的未被发现的估计至少还有近10万件。”^④徽州文书总数量远较原估计数字多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到底有多少，颇难估计。这中间还牵涉一个计算方法问题。如休宁县档案馆所藏从顺治四年（1647年）到民国时期的鱼鳞图册，总数达8万多件。此数字是“以内容相对独立原则进行基本数字统计，鱼鳞图册、弓口册、田亩清册由于有散页不成册者，从其内容均为地域田亩情况记载考虑，单独利用价值较高，故以一页为一件计”^⑤。若仅“以内容相对独立原则进行基本数字统计”，那么，抄契簿、租谷簿等，是以一本为一件，还是以簿中所记每件契约、租约为一件呢？现在看来，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标准，甚至一本书中对不同收藏单位和不同种类文书的统计方法也不一致，这给统计工作带来了困难。据严桂夫先生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说：“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推算，徽州历史档案现存总数目不下于13万件，其依据是：安徽省各级档案馆保存有9万多件，黄山市博物馆藏有3万多件，南京大学历史系保存的4453件，再加上其它收藏单位的档案数量。”^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收藏是4453卷（册），黄山市博物馆的收藏是3万多件，都是以卷、册、张为单位而统计出的数字，休宁县档案馆的收藏，以页计共8万多件，以卷计共4158卷，均为徽州文书。该书所述其他收藏单位所藏徽州档案，不知其中有多少是徽州文书，无从统计。上述黄山市博物馆所藏3万余件是70年代后新购进的，休宁县档案馆所藏4158卷是后来发现的，均不在余庭光先生所估计的由屯溪古籍书店卖出去的10余万件之内。现在看来，我们对徽州以外的收藏很难搞清，对徽州属县民间的收藏也探不到底，不知还有多少徽州文书不为外人所知。所以，难于对现存徽州文书数量做出有根据的估计。如非要说个数字不可的话，斗胆猜测，已被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收藏的徽州文书，以卷、册、张为单位计算，恐怕不下20余万件。

徽州文书的种类之多，早为人所知，许多论述徽州文书的文章中均有胪列。对徽州文书类别的分法，因收藏、整理、研究者的角度不同，亦有不同分法。有的从事档案工作的人，把包括文书在内的徽州历史遗存都归入档案的范围内，把古籍、碑碣、砖木竹雕等一概归为档案，将这些历史遗存分为徽州教育档案、徽州文化艺术档案、宗法制家族和经济档案、徽州官文书四类。徽州文书在这种分类中分列于徽州教育档案、宗法制家族和经济档案、徽州官文书中^⑦。我在《徽州文书的分类》中，将徽州文书分为八类，即：一、土地文书，二、赋役文书，三、商业文书，四、宗族文书，五、科举、官吏铨选和教育文书，六、社会文书，七、阶级关系和

① 《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10期《征解读一张地契》。

②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本英史教授和早稻田大学中岛乐章先生分别购得数十件徽州文书并赠给历史研究所。

③ 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黄山书社，1996年，47页。

④⑤ 刘伯山：《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价值》，杭州徽州学研究会编《杭州徽州学研究会十周年纪念文集》。

⑥ 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36页。

⑦ 王国键：《徽州历史文化档案的种类及其利用》，《徽州社会科学》1991年1期。

阶级斗争文书，八、官府案卷、档册、公文^①。即将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文书类目》将徽州文书分为九类，即：一、土地关系与财产关系文书，二、赋役文书，三、商业文书，四、宗族文书，五、官府文书，六、教育与科举，七、会社文书，八、社会关系文书，九、其他。在九类之下分122目，前五类82个目之下又分152个子目。可见徽州文书种类之多。

徽州文书种类既多，涉及面必广。这当中有两层含义：第一，涉及徽州本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诚然，就其数量而言，土地关系与财产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这三类文书占了绝大多数，难怪有人一提到徽州文书，就认为那只是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的新资料。其实，徽州文书反映从府政、县政到百姓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宗族“社”会、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涉及徽籍人士或因当官为宦、或因游学经商在全国各地乃至在海外的活动。虽说徽州文书的绝大部分产生于徽州本地，但不能说徽州文书只是徽州的文书。对于以徽州文书为资料的研究范围的广度，更要随研究的深入和眼界的拓展，有新的认识。本世纪二三十年人们就提出“大徽州”的概念，到了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交通的便利而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还有什么理由把我们的眼界仅限于徽州一府六县的狭隘范围之内呢？

跨越历史时代长是相对于现在国内其他地方发现的同时代的历史文书而言的。在现在的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发现了许多历史文书，如清代香港土地文书、清代珠江三角洲土地文书、明清福建闽北文书、清代台湾淡新档案、明清浙江严州等府土地文书和兰溪鱼鳞图册、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明清四川自流井档案、清代贵州文书、清代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清代江苏商业文书和太湖厅档案、明清安徽除徽州文书之外的历史文书（如宁国府南陵县档案）、清代河北获鹿土地文书、清代顺天府宝坻县档案、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土地文书等等。以上只是数例而已，稍翻一下秦国经先生所著《中华明清珍档指南》，就会知道各地所藏文书档案之多。在全国范围内所藏同时代历史文书中，跨越历史时代最长的当数徽州文书。闻见所及，徽州文书时代最早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②，最晚的是民国1949年的契约，前后延续730多年。

徽州文书的学术研究价值高是和徽州文书所具有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徽州文书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特点。

所谓启发性，是指我们原来不知道，或在文献中见过由于语焉不详而没有引起注意，徽州文书中的实物资料启发了我们的注意和认识。比如“契本”和“契尾”。在《元典章》和《大明律》中都说到契本，可契本是什么样子，是做什么用的，从未见有人说过。当我们看到明洪武二十八年祁门县契本^③之后，又看到同年月日同一桩土地买卖的契尾，既了解了契本的形制，也知道了契本和契尾的关系。再读《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元代契本^④，两相对照，便清楚了元、明两代契本形制的变化。又如契尾，过去只在文献上看到过“契尾”这个词，但没看到过实物。在看过从明洪武到清末的契尾，加以排比、分析，参考其他资料，我们才弄清中国明清土地买卖制度的历史。

所谓连续性，是指现存徽州文书历史的延续不断。前已述及，地方文书档案很多地方都有，

① 周绍泉：《徽州文书的分类》，《徽州社会科学》1992年2期。

② 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1995年，532页。该契约是一张抄白而非原件，徽州文书原件时代最早的是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的《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1，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1页）。

③ 原件藏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④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184页和图版32。

但往往只有一个年代的，缺乏这个年代以前和以后的，只是一个历史剖面的资料。徽州文书则有很强的连续性。即以明清诉讼案卷为例。台湾淡新档案、江苏太湖厅档案、四川巴县档案、安徽南陵档案、顺天宝坻档案，数量大、卷帙多、内容丰富，都是清代的，有的仅是同、光两朝的，难于窥见该地明清两代诉讼的变化。辽宁档案馆所藏明代辽东残档中也有明代诉讼资料，却只有书吏拟文和官员的批文，而没有诉、辩双方的禀状和诉状，研读起来颇费猜想，遇缺损太多的，便不得要领，无法致详。徽州文书中的诉讼案卷最早的是明宣德二年（1427年）的案卷，最晚的则延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延续近五个世纪而未中断。其中除官府所藏案卷之外，均为民间收藏而没有收入官府档案的资料。如县衙书办代为抄录并钤有县印的“抄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康熙三十二年休宁渠口汪、李、胡控案》）、家族抄录辑成的“讼词稿”（南京大学历史系收藏的《不平鸣稿——天启、崇祯年间潘氏讼词稿》）、家族辑辑单独刊刻成的案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嘉靖歙县呈坎罗氏《杨干院归结始末》）、家族撰辑收录于家谱中的案卷（黄山市博物馆藏《大阜吕氏族谱》最后一卷全部是讼案）、乡里书手收藏的地方诉讼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道光祁门高视《道光祁门官司状纸》）和单张状纸等。此外，还有明清两代徽州属县县令文集中的谏语（安徽省图书馆藏明崇祯年间歙县县令傅岩《歙纪》第九卷《纪谏语》、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年间休宁县令廖腾燧《海阳纪略》卷下）、乡间教人如何写状纸的类似“讼师秘本”资料（江西婺源县图书馆藏《珥笔肯綮》）和家族分摊讼费的文书等。延续时间长、内容如此丰富的诉讼资料对我们了解明清两代诉讼制度的变化及其运行实态，其价值不言而喻。它还起到“坐标”的作用，把其他地区的诉讼文书和它的同时期的诉讼文书作比较，便可知那个地区的诉讼文书在明清诉讼发展史中的位置。

所谓具体性，是相对于文献的泛泛描述而说的，利用徽州文书所做的研究，不是浮泛地描述，而是具体地说明。文献虽富，内容虽博，那里只是士大夫眼中的当时社会。它涵盖面比文书广，却未必符合实际；它也许生动活泼、色彩绚丽，但恰似雾里看花，并不真确。以实物为依据做具体的研究，才有望揭示历史的真实。即以对农民的研究来说，众所周知，从古至今，农民都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农民更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至今我们对中国古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研究却很少。过去中国史学界虽曾把农民战争史作为一个主要课题来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其中也涉及了农民生活的某些侧面，但主要还是作为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和原因，描述阶级矛盾激化时期的农民生活状况，而对平常情况下农民如何生活的，涉及甚少，更缺乏实证性的具体研究。这也难怪，在中国古代，农民既没有地主家族那样编撰的族谱，也没有地主家族那样世代撰辑、保存下来的宗祠簿、谱契簿、租谷簿等家族资料，很难追寻一个农民家族几十年甚至十几年的演变过程，不得不借助于士大夫记录的农民生活的只言片语来论述农民的生活状况，总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而徽州文书给了我们真实而具体的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揭开被士大夫层层遮盖的帷幕，看到真实而具体的农民的生活。如在徽州文书散件和谱契簿中，有36张关于祁门县五都榭墅（今洪村）胡姓农民家族九代人的文书。把这些文书按年代顺序排列，具体地反映出这个农民家族怎样从租佃地主土地开始，经过“葬主山”、“住主屋”沦为地主的仆人，怎样受地主的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怎样靠自己的劳动积攒起一部分“田皮”财产，又怎样被地主通过高利贷攫夺去。这整个过程都是真实而具体的。

真实性。真实性是历史文书档案与其他历史资料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历史文书档案是当时当事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直接形成的文件，并非后来为某种目的而编撰的材料，所以，它最真实可靠，可以作为历史的凭证。比如，土地买卖契约、租佃文约、借券、还文书、卖身契等原

件，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真实记录。此外，当时遗留下来的诉讼案卷、贴在衙门和乡村的布告、有全村成年男子署名画押的乡约合同等等，也都是未经任何人加工整理的原始而真实的历史记录。

典型性指的是一些个案资料具有某种代表性。比如我们研究地主，从族谱中可以知道某户地主是科甲不断、“奕叶功卿”的缙绅地主，某户地主却是数代无人中举而颇有田产的庶民地主，某户地主是土地积累主要靠商业利润购买的商人地主。通过调查研究，从不同类型的地主家族中，各选取一两个具体家族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其世系的递嬗，家庭的教育，科举的状况，土地的积累、管理和经营，宗祠的创立，族产的管理和运营，与官府和当地其他家族、农民的关系，商业的活动和资财的积累，等等，可以观察不同类型的地主家族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同种类型地主家庭又有什么共同的特性。比如明代祁门善和程氏，就是一户在明代出过五个进士的缙绅地主，这户地主除有历代修撰的族谱之外，还有管理家族的《羹山公家议》即族规家法、抄契簿、宗祠祭祀簿、各种会簿、租佃契约和诉讼案卷，此外，还有以这户地主家族为主的村镇志《善和乡志》，给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缙绅地主个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又如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里长户朱学源户的资料，既有《万历九年清丈二十七都五图归户亲供册》、《万历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万历二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万历三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万历四十年壬子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又有该户《万历四十年大造、天启四年大造、崇祯五年大造、崇祯十五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三甲朱学源户册底》及顺治八年、十三年、康熙元年、六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年各年《清初二十七都五图三甲编审册》，这样的从万历九年（1581年）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关于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及其三甲与朱学源户的长达120年的连续资料，既是研究该图、该甲，也是研究朱学源这户庶民地主的典型资料。丰富的歙县西溪南吴氏和休宁率口程氏资料，将会成为研究商人地主及缙绅兼商人地主的典型资料。

正是因为徽州文书具有上述诸多优点与特点，吸引了许多研究者全力以赴地研究它，以致出现了一门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人们预感到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罢，我们对徽州文书和徽学远不如外国学者敏感。1985年，当时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先生（Joseph P. McDermott 周绍明）在《亚洲文化研究》上发表《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的关键》，认为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①。1994年，日本著名学者鹤见尚弘教授在《东洋学报》76卷1、2号上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认为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就”，“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出版了从宋代到民国的达七个世纪以上的这一地区如此之多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对今后的中国史研究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②。日本徽学研究专家臼井佐知子教授在《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一文结语中说：“徽州研究的大特征可以说还是其丰富的资料。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

① 该文中译文见《徽学通讯》1990年1期。

② 该文中译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4期。

系、商工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文化等等。它也可以纠正局限于具体课题研究中易于产生的失误。而且，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性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性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①

三、徽州文书和徽学在学术史上的位置

鹤见尚弘先生关于徽州文书“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从一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徽州文书和徽学恰好给我们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提供了机会。

我国有清一代经学极盛，而史学萎靡。究其原因，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那时学问的对象只限于书本，而书本又只以经书为主体，经学又只要三年通一经便为专门之学。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余绪延至本世纪初，有人仍固守几本经书不放。

我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是以清末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大发现，特别是以甲骨文和敦煌文书的发现及由此而导致甲骨学和敦煌学的建立为契机而实现的。当时的学者多为新发现和资料而振奋，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写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些新发现，使人们从纠缠不清的经学争论中解脱出来，使得历史学以新发现和新资料为立足之根基发展起来。

当时学人都把精力集中在殷墟甲骨、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上，学界流行着书不读隋唐以下的说法。所以，本世纪初之史家多作古史，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竟言古史。”^② 即使有治明清史者，亦重官书正史而轻笔记小说。在文献资料中，认为官修实录、会典及后代所修正史才是可信的资料。在这些学者看来，笔记、小说之言，乃稗史野记，不足凭信。迨至五六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展开，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了飞速的发展，学者开始搜求实录、官书、正史之外的文集、笔记、小说、方志的资料。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随着明清社会史研究的走热，地方志和家乘谱牒更为研究者所瞩目。

我们知道，一个时代的朝廷政令和官书、正史所记述的政治制度，只是一种规定，它和这种政治制度运行实态之间有很大距离和区别。同样，朝廷颁布的经济政策和这种经济政策贯彻的实际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因此，研究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不能只以朝廷颁布的有关政令、法律为依据，而要看其在实际贯彻、执行中的实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半个世纪以来的明清史研究者已不满足于那种只依据官书正史的研究，扩大了研究资料的搜寻面，除当时人的文集之外，更多地从地方志和笔记小说中查找有用的资料，尽量缩小由文字所表述的形式上的制度与实际运行的制度之间的距离，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成果。

然而，若到此为止，仍停留在形式上的制度研究上。笔记小说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记载和描述，非常具体、生动，给人以鲜活的感觉，然而这只是历史上曾发生的具体事件在笔记小说作者头脑中的反映，并不是历史上的具体事件本身。更何况，笔记小说中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记载，

① [日] 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528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48页。

或相互抄袭，没有新意；或相互牴牾，让人无所适从。至于地方志，确实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丰富的资料，比起官书正史的三言两语来，要具体、详细。但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所说：“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①山本英史教授在《明清农村社会制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中亦指出，地方志名义上是当地行政长官编纂的，实际执笔者多为当地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出于特别的关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的记载还比较生动和具体。但总的来说，多是表面的、平面的、缺少个性的，而且往往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如对于某些事件，只要有关人物或其子孙尚在，并在地方上有某些势力，对其不利的东西，方志中就往往有意回避。特别是对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由于方志编者的不关心，偶有记载，也多是片断的，很少有生动的描述。^②

人们为了逐渐接近历史社会实态，开始注重比省通志和府、州、县志记载更具体的乡镇志和族谱。然而，乡镇志亦无法避免地方志的缺欠。族谱比乡镇志的记述更具体，乃一家的历史。本世纪初，梁启超曾说：“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谱研究的实践证明，家谱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它所蕴藏的丰富的历史资料，正有待学者去挖掘。陈支平先生指出：“因为族谱毕竟是私家所记，不受任何社会和公众约束，主观随意性很大。”因此，若据以研究历史社会实态，非经细心地鉴别取舍则不可用。于是人们越来越瞩目于历史文书档案。

人所共知，我们无法完全复原历史，但如何接近历史实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历史研究是为鉴古知今，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研究过去和现在是为了未来。我们在做鉴古知今的工作时，作为借鉴的“古”，是尽量接近历史实际的“古”，而不是臆想的“古”，才能“知今”。如果作为借鉴的“古”是虚幻的、模模糊糊的，甚至和历史实际完全相反的，又怎能“知今”？所以，研究社会历史实态是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而历史文书档案给我们研究社会历史实态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把社会和自然界的诸多现象中的一部分，从与其相互联系的诸多关系中抽出来，做孤立、静止地研究，产生了名目繁多的科学学科。几百年来，人们对这些学科分别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对这些学科分别进行研究的时候，排斥了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影响。须知，这些学科本是从社会和自然诸多现象中抽取出来的一部分，若真正的了解它，还必须把它放回到社会和自然界诸多现象中去。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孤立、静止研究的弊端，希冀改变过去“隔行如隔山”，连相近学科都不互通的状况，开始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研究相去甚远的学科的人坐在一起，共同作“无学科”的讨论。据一篇文章说，在美国有一个“圣塔菲研究所”。圣塔菲这个城市不大，从前也不出名，但现在却声名远播，因为那里有个“圣塔菲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谁也说不清它是研究哪个学科的研究所，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它自己创造出的一个新名词：复杂学科（Complexity Science）。研究经济学、物理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坐在一起讨论，参加讨论者都觉得互有启发，收获很大。他们觉得科学似乎到了一个关口，在它从最初的综合走向了分化以后，现在正面临着新的大整合^④。这种大整合实际

① 参见《江海学刊》1982年2期。

② [日]山本英史：《明清农村社会制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1994年“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报告。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15《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④ 黄艾禾：《时钟为什么要顺时针转？——圣塔菲传奇》，《中国青年》1997年10期。

是在做“放回去”的工作。

徽州文书为这种按历史本来面貌做综合实态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认清徽州文书的这个特点,在利用它做研究的时候,时时想到要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做综合实态研究,免得再把其中一部分抽出来做孤立的、直线的研究,等发现弊端之后,再做“放回去”的工作。

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材料和新问题,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能否把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徽州文书,或扩大一点,将其厘定为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历史文书档案,看做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材料呢?能否把“取用此材料”,综合研究历史社会实态,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呢?假若这两个设问都可以做肯定的回答,那么,徽学就不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潮流中的一个主流。

[作者周绍泉,1940年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责任编辑:仲伟民)

关于本刊专有版权和使用权的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为保护作者和本刊的权利,保证文献情报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声明如下:

1. 凡给本刊投稿的作者,应同意本刊对稿件享有一年为限的专有使用权,即稿件自刊出之日起的一年之内,未经本刊同意,任何个人和团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全文刊载;
2. 凡欲全文转载本刊发表的文章,或摘编转载本刊发表的文章,而转载文字达到原文的70%以上者,均需经本刊事先授权或同意;
3. 刊载本刊论文的摘要,或以简短概要的方式介绍和报道本刊的文章,不受以上限制;
4. 违反上述要求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5. 有关以上事项的联系可以使用本刊的电子邮件信箱(lsyj@magazine.cass.net.cn),但所有授权或同意的表达均以本刊编辑部的正式文字为准。
6. 以上声明自2000年1月1日起生效。

《历史研究》编辑部

1999年12月22日

CONTENTS

A Study on the Second Plenary Conference of the 6th Central Committee, KMT

Deng Ye (3)

The Second Plenary Meeting of the 6th Central Committee, KMT, marked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MT-CPC cooperation, leading to its breakup. It was at this meeting that the various KMT factions clashed over the principles on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Northeast. Chiang Kai-shek wavered in his political stance. The numerou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turned ultimately into a tremendous force that was politically disruptive, bringing about Chiang and the KMT's comprehensive withdrawal from the positions of agreements made at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Which constituted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Siping Campaign between the two armies of the KMT and CPC.

Key words: the Second Plenary Meeting / principles on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 the Northeast problems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1905 Boycott Against American Goods

Wang Lixin (21)

This boycott was a manifestation of an approach and ide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xenophobia. It gave expression to the rise of the ideology of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entire nation, operations of social associations and the mass media of a new style, growth of consciou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on the part of the masses, emergence of a modern social public opinion, and a civil and rational approach to foreign affairs. It was thus one of the earliest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mobilized by modern nationalism against the Western powers.

Key words: nationalism / boycott against American goods / Sino-American relations / state of the entire nation

Britain and the Stabilization Fund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urrency

Wu Jingping (34)

The evolution in the British attitude toward the Chinese Currency Stabilization Fund (CCSF) was also the process by which Britain's China policy became gradually more positive alongside of the sharpen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Japan in the Far East. When China adopted its national currency policy in 1935, Britain was not among the loaner states, and continued to be passive in this respect when Japan started it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n 1937. As responses to developments in the Far East, howev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rovided securities to British commercial banks for loans to the CCSF in 1939, and consented to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CSF in 1940. Then in 1941, the British Treasury allocated funds directly for the joint stabilization fund of China, Britain and the US. The disbanding of the same fund in 1945 marked the end of British influences in the sphere of the currency and finance of China.

Key words: stabilization fund / financial history / Sino-foreign relations